

杜威研究与中国教育学*

周 勇

摘要 胡适、陶行知等邀请杜威访华以来,杜威研究先后出现诸多意义不一的范式,这些范式多是围绕杜威教育理论本身展开分析,忽视了杜威这个人及其理论形成方式。这个人曾长期考察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美国剧烈社会变迁,探索美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“新教育”。如果像杜威这个人学习,便应考察当代中国近三十年剧烈社会变迁,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急需何种“新教育”,进而生产中国教育学。

关键词 杜威研究; 社会变迁; 中国教育学

作者简介 周 勇/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(上海 200062)

—

很难说清,研究杜威何以仍会被当代中国教育学界诸多学者视为大事,只知道源头需追溯到1919年3月。其时,胡适、陶行知得知杜威在日本访问,于是四处联络将乃师请到了中国。^[1]然而胡、陶请乃师来,本意并不是鼓励大家投身杜威研究。胡适真正要做的乃是在派系林立的北大继续积累势力,以在学术教育界造成一场新思想、新文化运动。陶行知尚有打算“勉力去做一篇《杜威的教育学说》”,但此举意在向“老兄”胡适为壮大新文化事业而创办的新刊《新中国》送去“厚意”,且陶先生实在忙碌,自知难以按时赶上创刊号,所以请胡适同意他放在第二期。^[2]

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抵达上海,几天后“五四运动”爆发,蔡先生辞职,一时风传北大要解散。蒋梦麟、黄炎培等“同人”皆希望胡适能替蔡先生稳住北大,等他们在南方办成大学时,“将北京新派移南,将北京大学让与旧派,任他们去讲老话,十年二十年后再比比优劣。”^[3]可见,在教育界拥有自己说了算的基地,向国人传播“民主”、“科学”等新思想、新文化,才是胡适及其同仁的要务。与这件大事比,杜威研究只是件小事。

陶行知这边也受五四运动影响甚大,时任南京高师教务长的他“不怕政府压

* 本文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“上海市教育学高峰计划”资助。